

DM73/0803

卜宪群 张南 著

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 本卷提要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文明，下开隋唐文化之先河。在教育发展上也是如此。虽然社会动荡给教育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思想的大解放，也使教育的发展呈现了新的格局。在学校教育上，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在出现，分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开创了教育史上的新时期。教育内容上突破了两汉皓首穷经的旧模式，玄学、佛学、道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都融合进教育中来了，教育内容大大扩展了。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官学的时兴时废，私学以空前的规模繁荣起来。私学家们不重功利，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学学生不畏艰险，千里寻师，他们为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教育相并行的人材选拔措施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活跃，除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外，中国历史上的三大人材选拔措施，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均存在或萌芽于这一时期。在教育思想史上也十分活跃，“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主张，反映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最后我们更需要看到，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民族的融合不仅仅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结果，也是文化相互认同的结果，教育无疑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手段。

# 目 录

## 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

<b>一、魏晋南北朝教育概述</b>	1
(一) 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	2
(二) 教育的基本特点	5
1. 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	5
2. 汉文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	7
3. 等级教育的出现和私家教育的昌盛	9
<b>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b>	13
(一) 三国的学校教育	13
1. 魏的学校教育	13
2. 蜀的学校教育	20
3. 吴的学校教育	22
(二) 两晋的学校教育	23
1. 西晋的学校教育	23
2. 东晋的学校教育	26
(三) 十六国学校教育	31
1. 匈奴刘氏的教育措施	32
2. 后赵的学校教育	33
3. 鲜卑诸国的教育状况	35
4. 氐人诸国的学校教育	37
5. 羌人后秦的学校教育	39
6. 汉人诸政权的教育状况	40

(四)南朝的学校教育	43
1. 刘宋的学校教育	43
2. 萧齐的学校教育	45
3. 梁代的学校教育	46
4. 陈代的学校教育	49
(五)北朝的学校教育	51
1. 北魏的学校教育	51
2. 北齐的学校教育	56
3. 北周的学校教育	57
(六)教育行政制度的基本演变	60
1. 三国两晋的教育行政制度	60
2. 南朝教育行政制度	61
3. 北朝教育行政制度	62
<b>三、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基本内容</b>	64
(一)立学以儒为宗	64
1. 儒学的独尊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	64
2. 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	66
3. 《五经》是官学的基本课程	74
4. 私人教育重视儒学	81
(二)玄风与佛学对教育的影响	86
1. 玄儒双修下的魏晋南朝教育	86
2. 佛教对教育的影响	93
(三)文化科技教育	97
1. 文学的独立与教育	97
2. 史学的繁荣与教育	102
3. 艺术的“变古制”与教育	105
4. 科技教育	109

<b>四、私学的昌盛与门第、宗族家庭教育</b>	116
(一) 私学的兴盛及历史地位	116
1. 私学昌盛的时代背景	116
2. 私学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	119
3. 私学与社会	123
(二) 私学的发展历程	126
1. 三国私学的发展	126
2. 两晋和十六国的私学	129
3. 南朝私学	133
4. 北朝的私学	136
(三) 门第的形成和门第教育	145
1. 门第的形成和发展	145
2. 门第教育的内容	149
(四) 宗族、家庭教育	156
<b>五、魏晋南北朝的人材选拔</b>	158
(一) 唯才是举,天下归心	159
1. 曹操的“求才三令”	159
2. “唯才所宜”与“廉节自励”	161
(二) “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162
1. “九品官人法”的出台	163
2. 九品中正制的蜕变	164
(三) 察举制的演变	172
1. 重视孝廉、经学取士	172
2. 孝廉试经、秀才试策	174
3. 策试正常化与评分标准	176
4. 秀、孝两科泾渭分明	178
(四) 科举制的萌芽	180

<b>六、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b>	183
(一)傅玄的教育思想	184
1.傅玄的生平及思想倾向	184
2.“尊儒贵学”的教育主张	187
3.傅玄的人材思想	190
(二)嵇康的教育思想	192
1.嵇康的生平及政治倾向	192
2.嵇康对经学教育的批判	194
3.“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主张	197
4.养生教育思想	198
(三)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202
1.家世、生平及处世哲学	202
2.颜之推的教育基本思想	204
3.关于士大夫教育	206
4.家庭教育思想	209
<b>七、结 语</b>	214

## 一、魏晋南北朝教育概述

东汉中平6年(189年)初春,灵帝驾崩。灵帝之死导致了东汉外戚与宦官矛盾的总爆发。各地军阀借此机遇,“飘扬云会,万里相赴”。<sup>①</sup>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序幕。汉献帝元康元年(220年,即魏黄初元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上,其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代汉建魏。221年、222年刘备、孙权相继在西南、江东称帝,合称三国。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60年,晋泰始元年(265年),河内(今河南温县)大族司马炎代魏立晋后,并于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18年前蜀亡于魏),实现了短期统一。但由于西晋统治者内部的腐朽与倾轧,激化了民族矛盾,晋建兴四年(316年),洛阳被攻破,西晋灭亡。晋室东渡,于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史称东晋。此后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出现了所谓“五胡十六国”,历经北魏的统一北方,随后又出现了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的分裂;而南方继东晋之后,也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前后交替的王朝,史称南北朝。南北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这段历史称为魏晋南北朝史。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注引《典论》

## （一）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

任何时代的教育都与该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发展分不开。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的教育,更需要获得政府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统一,人材选拔的完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无疑对教育发展大有裨益。我国古代教育的几个繁盛时期,诸如汉唐宋明,大体就是这样的。而分裂时期,战争连绵,政出多门,选举混乱,不仅影响着统治者对待教育的政策,而且影响着各阶层对待教育的心态。

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治者忙于纷争,无暇顾及教育,造成学校教育的时兴时废。从东汉末年至魏文帝初年,学校教育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魏文帝黄初5年(224年)于洛阳初立太学,竟然需要“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阙坏”。<sup>①</sup>蜀国“承乱历纪,学业衰废”,<sup>②</sup>至刘备定蜀后方设立太学。孙吴虽设国学校较早,但直到景帝孙休永安元年(258年)方立五经博士,故其太学的功用甚微。两晋太学也时断时续。大体上看,西晋一朝由于实现了短期统一,晋武帝本人也颇具才干,教育也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所谓“祁祁生徒,济济儒术”即反映了这种状况。<sup>③</sup>东晋一朝国学设立虽早,但每临战乱,随即解体,反复3次。南朝历169年,但易代3次,内外矛盾激烈,承平日短,学校教育因种种原因难以继续。南朝只有宋文帝、齐武帝、梁武帝几个皇帝在位时,学校教育出现短暂繁荣。十六国和北朝的学校

① 《三国志·魏书》卷63《王肃传》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蜀书》卷12《许慈传》。

③ 《晋书》卷55《潘岳传》。

教育是与汉化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素质很有关系,统治者汉化程度深一些,对教育就重视一些。但是他们往往国祚太短,学校教育兴时短、废时长。其次社会变动使完整的教育体系难于形成。无论在学校设置、教育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上往往各不相同。如同是儒家经学,魏、蜀、吴三国各有侧重。曹魏重古文经学和玄学化的经学,蜀仍守古文经学,没有玄学化,孙吴却主今文经学。同是经学,南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sup>①</sup>这是因为南方习于玄风,北方较为固守传统。在教学内容上北方儒道佛结合的比南方紧密,玄风影响不广泛,在学校教育中未占一席之地。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南方也重于北方。教育体系的多样化既与分裂割据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与当时教育的等级化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有关。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这种多样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杂乱,其间也包含着创新。南北的差异,胡汉的差异,其中都杂揉了不少有价值的新内容,这为隋唐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以及很多具体科目的设置,都可以从魏晋南北朝寻其根源。第三,社会变动对各阶层人物的教育心态影响也是巨大的。任何时代的教育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无不带有某种功利性,汉代有“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的谚语,唐太宗窃喜通过科举制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的割据和纷争,给人的心灵蒙上了很厚的阴影。人生无常,如“白驹过隙”的观念,使人们不愿去追逐功名,这一时期隐逸人物的骤增,也反映了这种状况。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由血统就可以窃据高位,而寒门庶族即使品

<sup>①</sup> 《北史》卷 81《儒林传序》。

学兼优,才智过人,也永远只能列入“下品”。自由农民农奴化的趋势,使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独立的自耕农比两汉大为减少,他们生活极端痛苦,何谈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我们很难看到“布衣将相”的现象,也很难看到两汉时那种家境贫寒而励志学问,最终获得高位的人物。这样,对于士族和寒门庶族,包括广大平民来说,接受教育就没有什么必要性了。试以北齐为例,胄子由通经而致士竟只有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二人而已。<sup>①</sup>北齐高昂“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sup>②</sup>这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对于一般庶族地主子弟来说,求学竟成了一种避役的手段,所谓“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sup>③</sup>另一方面,在玄风的熏陶下,教师和学生皆祖尚虚玄,追求浮夸,认真追求学术的人不多了,这就是刘馥所说的“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sup>④</sup>而汉代经学固然繁琐,但对学子来说亦是强迫他们下苦功的一种手段,沽名钓誉,浅尝辄止是难以成功的,特别是古文经学更是如此。但魏晋学风一变,不仅“周孔之业,弃之度外,”<sup>⑤</sup>而且学业少有师从,虚玄与放诞往往却能使人刮目相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这方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图景,那些“放达”、“英拔”、“玄远”的人物,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不过世风如此,学子亦只能随波逐流了。诚然,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影响无疑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重要侧面,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所不可忽视的。

① 《北齐书》卷14《儒林传序》。

② 《北齐书》卷21《高昂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

④ 《三国志·魏书》卷15《刘馥传》。

⑤ 《颜氏家训·勉学篇》。

## (二)教育的基本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尽管社会变动给这个时代的教育带来种种影响,但从宏观上看,它并不背离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大模式。它在融合,在蜕变,在更新。这个时代的教育出现一些新特点:

### 1. 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

经学即儒学。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在教育中获得了正统地位。彬彬文学之士,在官僚政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特别是东汉,功臣多习儒学,累世经学的世家激增。但一方面儒学并没有能够挽救东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经学的神秘化和繁琐化,使其自身的虚伪性愈益突出。汉代的谚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为泥,高第良将怯如鸡。”<sup>①</sup>在这种世人所厌的情况下,汉末士风为之一变,对此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已有精辟论述,<sup>②</sup>兹不赘言。汉末士风的转变是由经学向玄学的转变,从形式上看它由一种“任诞”的风气向哲学化发展,大体在西晋初年完成,并影响东晋南北朝。玄学的产生和发展对教育突破经学范畴是有作用的。因为它赋予了儒学(名教)以新的解释。《晋书》卷49《阮籍传》附《阮瞻传》载:“(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毋同’。”(《世说新语·文学》作阮修问王衍),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掾”。魏末晋初统治者所要解决的就是名教与

<sup>①</sup> 《抱朴子·审举篇》。

<sup>②</sup> 见《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自然的矛盾，阮瞻的话冰释了王戎心中的郁结，深得其欣赏。在王戎看来，自然是本体，名教出于自然，二者本不是对立之物。承认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本身已突破了两汉儒学的内涵。首先它承认了人性的地位，在家族伦理上突破了两汉“孝”的价值观，给予人性和人情以一定的尊重。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两汉君臣关系的概念，从汉末的“汉阴老父”到嵇康、阮籍、鲍敬言、陶渊明，在思想上早已动摇了那种“君权神授”的观念。我们认为对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对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是承认“自然”本体论，有助于教学内容的扩增。魏晋南北朝时期死守章句的情况不见了。文学、史学、玄学、科技、宗教在教育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试以玄学为例，玄学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价值观，是衡量士人的基本标准之一。在这一时期的正史和笔记野史中，人们往往以“儒玄并综”、“好伦儒道”来评价人物，没有“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或“喜怒不形于色”的气质，是难以被世人所推崇的。至南朝刘宋文帝元嘉16年（439年），开馆于鸡笼山（今南京市内），立玄、儒、文、史四科，教授学生，玄学便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sup>①</sup> 其二是“才性之争”扩大了人们对人材选拔这一教育重要目的的认识。“才性之争”也称“四本论”。这一争论始于魏末。《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注引《魏志》：“会论才性司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这些言论没有详细材料流传下来。大体说来尚书傅嘏、侍郎钟会认为二者是同和合，中书令李丰、屯骑校尉王广认为是异和离。“才”即才能，“性”为德性。傅嘏、钟会所说的同和合，即认为有德即有才，才和德是一致的；而李丰和王广则认为有才未必

<sup>①</sup> 《南史》卷5《宋文帝记》。

有德，有德未必有才，才和德是不一致的。“才性之争”显然是针对汉代选举不实，重德不重才而发的，不过也有其现实政治的背景，那就是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曹操重才不重德，而司马氏则是四世“伏膺儒学”，“才性之争”是他们政治斗争借以表现的哲学形式。这场争论对教育是有影响的。汉代社会事实已经证明，德的衡量标准有很大的误区，虚伪的东西太多。越是没有才的人越是以“德”来装饰自己，以沽名钓誉，对社会却毫无益处。而才却是虚伪不得，“治国用兵之术”是虚誉所做不到的，这就迁涉到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为德才兼备的人毕竟是少的。这场争论从以后的政治实践来看是曹魏集团失败了，但人们认识到了“上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得”，在二者矛盾的情况下“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sup>①</sup> 颜之推亦认为“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sup>②</sup> 也就是说仅有德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真才实学。“才性之争”波及东晋南朝，但在那时已演变成玄学家的谈资了。

## 2. 汉文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

这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斗争所结出的硕果之一。在世界历史上的几乎同一时期，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但罗马文化并没能同化蛮族人。在罗马的废墟上，小国林立，征战连绵。魏晋南北朝之所以历“五胡十六国”而后能再造一统的隋唐帝国，与汉文化的传播和认同是截然不能分开的。这一时期的汉文化传播是以各少数民族“汉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间，虽经“胡化”逆流，但未占主导地位。第一，这一时期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以精通

<sup>①</sup> 徐幹《中论·智行篇》。

<sup>②</sup> 《颜氏家训·勉学篇》。

汉文化自诩。最先起兵的匈奴人刘渊曾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sup>①</sup>羯族石勒，奴隶出身，不识文字，却常常让人读书给他听。有一次他听到酈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后听到张良谏，方说：“赖有此耳。”<sup>②</sup>这既反映了他的见识，也反映了他勤于学习汉族文化。前秦苻坚“博学多才艺”，后秦姚兴常与人“讲论经籍”，就连卢水胡沮渠蒙逊也“博涉群史，颇晓天文。”<sup>③</sup>他们汉文化的获得通过各种途径，有的是向汉族士人学得，有的是年轻时或为质子于长安，或游学于太学而学得。但从总体上看，乃是民族交流的结果，没有大规模的融合，是不会把这些僻处一隅的少数民族首领卷入汉文化圈的，这比汉代进步得多了。第二，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为汉文化教育向各少数民族中下层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各少数民族上层对汉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致力于汉文化教育的传播。他们在各自的国内，援引汉族名儒，设立学校，汉文化教育没有因民族斗争而覆没。前赵、后赵皆设立太学，重视人才的培养。前秦苻坚亲临太学，检查诸生的学习成绩。北魏不仅太学昌盛，而且郡国学制也普及甚广，使大批中下层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原来落后的习俗被革除了，汉族的礼乐文化普及到各族人民。前燕慕容廆执政时“路有颂声，礼让兴矣。”<sup>④</sup>有人说汉化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腐朽东西，殊不知表层文化的接受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深层次的内含。在当时，汉文化代表着先

①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② 《世说新语·识鉴》。

③ 见《晋书》各载记。

④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进的生产力,各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族礼乐文化之后,在经济上都推行了封建制度,汉化是与封建化同步进行的。第三,汉文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使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历经近4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北方周边民族如汹涌的潮水奔向中原,会合在汉民族的海洋里。从经济制度上,他们接受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并推陈出新,制定出均田制。从政治制度上,北朝的门下省制是我国古代三省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府兵制兼采汉文化(《周官》)和鲜卑文化而形成。尤其是经历汉文化教育之后,各少数民族有了属于自己的文人和学者。北朝末年,在鲜卑步六孤氏(汉姓陆)中产生了我国一个著名的声韵学家陆法言,著有《切韵》。元魏宗室元纁十步成诗,形神兼备。隋唐时期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家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汉文化教育的结果。

### 3. 等级教育的出现和私家教育的昌盛

两汉时期除“七科谪”以外,良家子弟皆可通经致士或由察举征辟而入仕。魏晋南北朝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中正定品依据的是家世。因此高门阔阀可以有世及之荣,而寒门庶族无寸进之路。在教育上表现出来的就是等级性的出现。西晋咸宁二年(276年)初立国子学,要求“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待、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sup>①</sup>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更明确规定“……学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国学。”<sup>②</sup>西晋本有太学,太子也本在太学读书,为什么又要另立国子学,而将太子迁入国子学呢?这是九品中正制的等级观念在作

<sup>①</sup> 《晋书》卷24《职官志》。

<sup>②</sup> 《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

崇，南朝人就已看出：“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sup>①</sup>很显然，在国子学学习的人其身份地位比在太学学习的人的身份要高贵。从武帝创始到惠帝定型的国子学是九品中正制度在教育上的反映。这种区别在当时是十分严格的。《晋书》卷94《隐逸传》记载了一个叫霍原的人，才高望重，但地位低，国子学的贵族子弟想与他交往，却怕失去身份而遭清议，白天不敢去，夜里才偷偷相见。这种区分出身的教育方式，不仅波及东晋南朝，而且对各少数民族的国内教育亦有影响。后秦姚萇立太学，为的是“礼先贤之后”。<sup>②</sup>北魏献文帝立郡国学校，明确规定：“先尽高门，次及中第。”<sup>③</sup>等级教育的出现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与官方学校教育衰颓相反，私学在这一时期颇为发达。台湾学者杨承彬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私学“不及东汉”<sup>④</sup>未免失之偏颇。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渊源固然可溯至东汉，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的改变。私学所覆盖的层而远比东汉广阔，入私学而接受教育的人激增，私学的教授内容也比东汉丰富得多。关于私学的发展历程将在后章详述。魏晋南北朝私学发达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第一，政局紊乱，国祚命短给私学发展留下了巨大空白。一些统治者纵然想留心教育，但终究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不得不把教育放到次要的地位。加上政权更迭频繁，教育政策难以延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出于对传播文化的责任感，出于对教育的热爱，潜心学术，培养后人。如魏的隗禧、管宁，蜀的向朗，西

① 《南齐书》卷9《礼志上》。

② 《十六国春秋·后秦·姚萇》。

③ 《魏书》卷48《高允传》。

④ 《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晋的束皙，南朝的刘瓛，北朝的马光等等。他们的教育成果既使汉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又为各个政权特别是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必备的人材。第二，思想界的剧烈变化对私学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始玄风，佛、道二教与儒学相结合，思想界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他们各创私学，传授经籍。如晋代的杨轲是《易》学专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sup>①</sup> 南齐杜京产聚徒传授道教。陈代的徐孝克“旦讲佛经，晚讲《礼》、《传》”，受业者数百人。<sup>②</sup> 第三，门阀世族的出现及其势力的扩展，深刻影响着私学的发展。门阀世族地主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垄断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亦以门风相标榜，因为这是士族区别于庶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门阀士族对家学是尤为重视的。他们的家学代代相传，并且有保密性，如所谓“王氏青箱学”和“王太保家法”等。私学在门阀世族地主那里以“家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含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如谱学、儒学、玄学、佛学、道学、书法、文学、艺术等等。门阀世族家学的发达，是推动这一时期私学昌盛的一个极重要原因，其本身亦构成了这一时期私学的重要内容。第四，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推动了私学的兴盛。魏晋南北朝的宗法组织远比两汉强大，除大地主的田庄以外，许多自然村落也都聚族而居，而教育是维系这些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农隙之际，宗族里通经史者，“训诱宗教，侃侃不倦。”<sup>③</sup> 《四民月令》中也反映了田庄中有私学教育。即使在战乱流离，举族迁徙中，私学依然不辍，庾袞在禹山坞中即因“惠训蒙幼”而受到宗族乡党的敬仰。私学在宗族组织中的发展，一方面与这一时期战乱有关，另

① 《晋书》卷 94《隐逸传》。

② 《陈书》卷 23《徐孝克传》。

③ 《晋书》卷 88《孝友传》。